
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

蔡宏政

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起源於立法院對服貿協議的草率通過，對服貿的爭議既涉及到臺灣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下的自由貿易位置，又直接觸動到中國以經團政的敏感議題。在過往，臺灣通過世界經濟與其他國家進行交往，進而維護實質的（de facto）的獨立地位，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經濟關係反而成為中國政府影響臺灣的有力武器。如果臺灣經濟從金融到產業，通過兩岸政治與經濟菁英的中介，全面性地依賴中國經濟發展方向，臺灣實質的獨立也就轉成實質的統一了。人權、民主、自由失去物質力量的植根母體，將會如同離根的落葉，沒有生活的內容，只有抽象空洞的憑弔意義。太陽花學運抗爭必須提到這樣的歷史高度，才能探觸到臺灣歷史的主旋律。

○ 一、自由的應然與實然

自由是一切價值中最重要的，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是生命存有的道德形上學理由。人因自由的選擇而成為完整的人，因為唯有在自由的選擇中，人得以體現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成為純粹的工具。第二是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實踐理由。自由乃一切價值的園地，不管是民主、和平、各種認同，或是社會正義，各種價值在不同條件下的複雜意涵只有在自由地思考、討論與行動中才能被不斷的釐清與定義，因此「目的的王

國」（人的存在皆為其自身之目的）必須預設自由的實踐。第一原則是第二原則的指導價值，第二原則是第一原則的具體實踐，邏輯上雖然清楚，但是實踐上衝突不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臺灣——中國關係就是一個具體例子。

現行國際體系中沒有高於國家之上的司法管轄權，國家主權成為護衛集體自由的最高權力，其目的在保護國民自由免於他國之專斷意志，這就是為什麼臺灣的國家主權是兩岸關係中最重要的目標。但是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國家主權經常無視於人民之自由意志而被更易，主要的改變方式有兩種，這兩種方式主要是對應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來。

○ 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主權改變的兩種方式

現代世界體系的基本結構是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與諸多主權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但這個推動世界改變的力量，源自於日益精密的分工與貿易。主權國家之間相互競爭，但是競爭所需要的大量物質積累卻需要跨國的生產、貿易與資本流動；相對的，資本家跨國移動以追求更大的資本積累，但是利潤的實現卻必須依賴於主權國家在實質司法管轄上的協作。由此產生兩種解釋世界發

展的觀點，自由主義者強調生產要素在全球市場的自由流動將帶來最大多數的最大效益，自由市場最重要歷史意義是以和平、自願合作的方式，將人類全體帶往自由與共同富裕的社會。另一方面，保守的國家主義者（重商主義，以及東亞國家領導發展模式）則強調，市場運作必須從屬於一套對國家忠貞的價值體系，毫無節制的商品化只會破壞最重要的政治穩定。所以保守的國家主義者認為好的市場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能被政府管制的市場，勞工在經濟中扮演的功能就如同士兵之於軍隊，是共同獻身於一個以偉大民族之名而運作的國家機器。也因此，個別民族國家與全球連結的市場，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處於一種相互需要，卻彼此征戰的結構性位置。

世界體系下沒有高於國家之上的司法管轄權威，傳統上一國之意志要強加於他國意志之上，最快的方式就是發動戰爭，直接改變一個國家的主權狀態，但是純粹的武力壓迫通常無法建立穩定而有效率之統治。相對地，通過跨國市場影響國內市場，從一國之社會基礎改變這個國家選擇的可能，雖然作法較為間接，也較費時費力，但因為市場在形式上是自願的契約行為，因此這種影響一旦形成，會產生一種基於和平自願的吸引力，而不是戰爭暴力的脅迫，這種統治方式的效果更持久，經濟分工更穩定而有效率，其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力也更全面與深入。

中國對臺策略就是從第一種方式逐漸進入到第二種方式，通過穿透國界的市場力量進入臺灣，以經濟力量累積中國印象，建立中國標準，從而改變臺灣主權根植的社會基礎，達到改變臺灣之意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國一方面不履行兩公約或人權憲章，另一方面卻持續輸送觀光客到高雄，等到有一天臺灣要邀請熱比婭、陳光誠或達賴來臺，就中止觀光客客源。或者，中國繼續在「內地」舉辦高規格的「我是歌手」，但排除非常有臺灣味的江蕙、伍佰等人，再由臺灣渴求利潤的電視台播出。最新的攻勢則是簽署服務貿易協定，通過系統性的資本與人員往來，將中國因素根植於臺灣的社會經濟土壤。這些「公民社會」的交往最終的目的是讓臺灣人保持形式上的主權自由，但在實質上漸次地侵蝕，乃至於限縮臺灣社會的自由選項，它將使得公民投票產生帶有欺瞞性的政治幻覺，臺灣人以為他們在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實際上，這種公民投票只是慶祝統一的政治儀式，而這正是馬政府盡力配合的施政主軸。這種策略之所以有效，一方面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為兩岸發展下了結構性的定義，另一方面也是臺灣與中國在國家發展上因各自特點所造成的歷史多重因素的匯聚結果（historical conjuncture）。

◎ 三、臺灣主權與全球資本主義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美國國務卿訪問中國，日本隨即在九月與中華民國斷交；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這個外交災難對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造成幾乎致命的打擊，對內則挑戰了國民黨政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威權統治基礎。面對這個災難，蔣經國開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經貿外交，通過強化臺灣在世界市場上的經濟力量，來替代中華民國失去的政治機會。雖然因此讓資產階級進一步的壯大，但當時的資產階級是由威權國家牢牢控制，所以經貿外交實為國家控制市場力量以維護主權的操作範例。

然而，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有三個因素在歷史中交疊，產生經貿外交的「反效果」，使得中國可以通過世界市場的經濟力侵蝕臺灣的主權。第一個因素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所造成的區域投資、產業分工與貿易的重組。一九七〇年代以降，原本因二戰而產生空缺的產能已被逐漸填滿，新投資帶來的生產力卻日益下降，失業問題浮現，過去因為經濟榮景而上升的薪資則不斷累積通貨膨脹的壓力。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則給這個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再加一記重擊，油元一方面增添了海外美元的游資規模，增加全球過度投資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因為石油成本提高，推升物價，二者共同產生了

凱因斯主義所無法解決的「滯脹」(stagflation)問題。面對戰後資本積累的難題，國家與市場這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又開始被重新檢驗，只是這次情勢逆轉，鑲嵌式自由主義中的國家領導角色開始被質疑，政府的決策不見得比一般大眾的市場行為更不追求私利(例如尋租或貪污)，即使政府決策是出於公共利益，也不見得能做得比市場更有效率。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所採取的政策變革就是這種思維邏輯下的結果。通貨膨脹的癥結被認為是政府負擔過多公共任務與福利供給，以至於貨幣發行過多。解決之道首在縮減政府支出，提高市場的紀律與分配功能，產生更具有生產力的供給面，使經濟繁榮，才能從政府的「人為」干預中解脫，帶領大眾走出這一波的景氣衰退。一九八〇年美國的雷根政府採取更全面性的政府干預以促進自由市場，也就是賦稅減免，以利資本做出比政府更有效的投資。

以美國為首的全球新自由主義之虛偽性至為明顯，在邊陲與半邊陲國家被要求縮減政府支出以讓位市場的同時，雷根政府自己卻大肆擴張政府與貿易赤字政策，導致美國的金融帳盈餘(也就是反映其經常帳赤字的規模)¹在一九八三年首波飆漲(圖

¹ 因為美國以發行國債吸引國外資金進入，藉以融資貿易順差，因此金融帳的盈餘(國外資金的進入)反映的其實也就是經常帳的赤字。

一)。為了改善國際收支，雷根政府對高美元儲備的東亞貿易夥伴施加壓力，要求這些國家降低關稅，以及貨幣對美元升值，以建立更為「自由」的貿易市場。一九八五年九月，在美國的策畫下，七大工業國中的美、英、德、法、義五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訂「廣場協定」(the Plaza Accord)。以日本為首，東亞四小龍(香港除外)的幣值在一九八〇年代下半開始大幅上升，並在一九九五年以前維持這波升值的幅度。東亞區域匯率的調整引發東亞國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分工重構，導致亞洲區域內投資與貿易量的增加，降低東亞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形成亞洲經濟區域化。

第二個因素是在這種區域經濟結構轉型中，臺灣的民主化過程造成威權國家退位，資產階級力量上升，務實外交日益走到另一個邏輯的終點：國家的利益依賴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資產階級的利益就代表人民的利益。美國金融帳的飆升導致美方要求關稅降低²與臺幣升值，由上而下的臺幣升值加重資本家的匯損。與對外投資的壓力，但由下而上的政治與社會反抗運動卻使得土地與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整個一九八〇年代，臺灣的超額儲蓄迅速地上升。一九八九年王永慶因六輕計畫受挫，邀集八大資本家在經濟日報發表「資本家之怒」一文，宣布暫停國內投資，凍結人事，充分表現典型的投資罷工，也標誌了臺灣資產階級已經有明確的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之集體行動。

為了因應這個結構性改革，行政院在一九八九年設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過去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壟斷性國營事業以自由化為名，開放資本家投資，展開私有化的轉換過程。百大企業集團營收占GNP比重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七七，上升到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三點八八，雇用人數占臺灣地區就業人口比例則從百分之四點六二，上升到百分之八點一九。⁴同年也開放外匯管制，開始了臺灣通過對外投資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從此臺灣正式成為世界經濟中的半邊陲國家。一九八九年也開始修改「銀行法」，在舊有國家獨占性地掌控信用分配外，開始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全國性金融領域，一方面消化超額儲蓄，另一方面提供一個新的投資領域以進行資本積累。十九家申請者中通過十五家，其股東幾乎涵蓋國內主要大企業，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再一次的集體亮相。⁵

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以來，資產階級的力量更因為區域經濟轉型而逐漸增強，以

2 一九八〇年代關稅大幅調降了三次，其中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調降項目就多達三千多項。請參見吳挺鋒〈財政政治的轉型：從威權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二〇〇四。

3 從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臺幣升值幅度達百分之四十。

4 參見翟宛文與洪嘉瑜〈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四十七，二〇〇二，頁三三三～八三。

5 參見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一九九六。

全球化為名，通過增強中國投資規模，達到對臺灣政府與社會對投資罷工的讓步。在提高產業創新（所以需要提高租稅優惠）與生產競爭力（所以必須降低勞動成本）下，不斷迫使政府與社會必須對市場的商品化邏輯讓步。首先，臺灣在二〇〇二年加入WTO，此舉使臺灣產業必須在更大幅度上符合自由貿易的開放條件。但是由於WTO是多邊組織，而且有國民待遇原則，所以臺灣還能在相對公平的世界經濟結構下競爭與產業升級。但是隨著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五年WTO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失敗，各國逐漸轉向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中國以香港的CECA模式，與臺灣展開ECFA的談判，並排除臺灣加入區域多邊貿易協定（如ASEAN），臺灣經濟就隨著中國經濟兩位數的成長規模，逐漸被鎖入依賴中國的處境。二〇一二年總統大選尾聲，一群大資本家逐次列隊出場，支持一個他們也說不出具體內容的九二共識，清楚地表明務實外交已走到歷史的反面位置，讓中國得以通過世界市場的經濟力侵蝕臺灣的主權。這就來到第三個因素，也就是中國在區域經濟的權重增加對臺灣的影響。

◎ 三、世界體系下的中國夢

一九九二年之後的中國決定繼續朝向與世界經濟整合的路線發展，這一決定引發

中國國外直接投資在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七年間如同直昇機般上升，進出口占GDP的比重同步擴張，對美貿易比重、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也相應地急速上升。⁶東亞區域經濟的形成與中國經濟規模權重的改變，下列兩個因素相輔相成，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起因於自由化之後的跨國資本投機性地進出工業化體質脆弱的東南亞國家，將過去東亞引以為傲的國家領導發展模式轉變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暴露出東亞區域經濟相互間缺乏支持的風險，因此，強化東亞區域內的經濟整合變成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發展策略。其次是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五年WTO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失敗後，各國轉向難度較低的雙邊或較小範圍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二〇〇二年東協與中國正式簽署了「東協與中國全面性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東協加一」模式遂因應而生。中國因為經濟規模巨大，很自然地成為各種雙邊貿易協定的軸心。最後，中國三十年來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特別是從二〇〇一到二〇〇八年的GDP就增加了三兆美元，相較之下，二〇〇八年由美國所引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導致傳統核心國家經濟地位下降，「北京共識」儼然代表世界經濟的制度創新，

⁶ 參見蔡宏政，〈全球化、區域整合與中國崛起的條件〉，《思與言》四十五（二），二〇〇七，頁一〇二至一〇九。

所以可以說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經濟結構已經偏向對中國有利的局面進行。但是這個轉變的政治意涵卻被右派的自由市場與左派的「亞當斯密在北京」（如阿里吉）共同掩蓋住其腐臭的味道。

不管中國強調它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具有中國特色」，呈現在貧富差距、階級支配、資產私有化，以及相對應的社會階層化上，中國都清楚地走向一個極權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博蘭尼所謂「自律市場乃是一個神話」在中國這個案例表露無遺，中國邁向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積累不是去管制化的結果，恰恰相反，它是在國家嚴格的管制中才得以高速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進口替代重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是依賴對農業剩餘的高度榨取。在人口年增率為百分之二點四的情況下，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五二—一九五七）中國民所得依然可以達到百分之八點九的年平均成長率，投資增長率則由戰前的百分之五陡增到百分之二十，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大約等同於一九二八年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最高峰。⁷ 這個驚人的成就來自於壓縮對農業部門的投資，同時又要求農業產出必須成為工業資本形成的來源。因此中國的農民事實上是承受雙重的剝削，因為除了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他們還必須忍受國家刻意壓低到維生水準以下的實物工資。其壓榨如此之嚴厲，以至於國家機器必須嚴格執行戶籍制度，以阻絕農村人口往都市遷移。

計畫經濟的基調就是以犧牲農民來換取高度工業資本積累的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相互隔絕的二元發展。⁸

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比較優勢」，就是國家配合跨國資本，以戶籍制度維持階層化的公民身分，使農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視性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工資被看得見的手，制度性地壓低到「廉價」程度。農民工的再生產成本幾乎都由自己負責，低工資與低福利是中國勞工廉價公開的祕密，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閒人莫進」的剝削機房。中國農民，這個維持計畫經濟高積累率的法寶，在改革開放後繼續擔任「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高積累率之墊腳石。從早期心虛的「市場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到中期遮遮掩掩的「姓社姓資，存而不論」，以至現今昂首高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張茵，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同時也是東莞富商與富比士榜上的富豪，如今已經可以毫無愧色，甚至於受盡委屈般地公開說出「血

⁷ Nicholas R. Lardy,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1987, pp. 155-156.

⁸ 參見蔡宏政，〈中國社會福利體制階層化的政治經濟學根源〉，《臺灣社會學刊》五十，二〇一一，頁一一一—一六三；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汗工廠是遭人忌妒」⁹，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甚至強調，血汗工廠是中國的「後進發展優勢」¹⁰。

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的資本主義有一個內在的緊張性。一方面，積累的要求會將人類社會與周遭環境不斷商品化；但另一方面，做為勞動力來源的人，卻不可能只以勞動力商品的方式存在，因為人同時也是道德、宗教與美學上的存有者，後者才是構成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理應成為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卻被資本積累的日常運作凌越踐踏，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

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為何會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供了一個饒富深意的論證：工具理性之所以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是宗教因素，它讓資本積累成為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的象徵，換言之，工具理性之所以能轉化為終極的價值理性，是由於人們的自我定義而成。人類在資本積累中找到他們皈依的終極價值。

事實上，資本積累被轉化為俗世的終極價值，有比韋伯論證更為普遍的世界史意義。從重商主義開始，「資本積累」一直都是民族國家發展策略中主要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只是這個終極價值不是由宗教母體破繭而出的自利動機，而是一種被想像成道德共同體的民族主義；人們義無反顧地碾碎自我身心，奉獻於國家的資本積累，以便在

民族興盛的英靈殿中獲得永生。不管是計畫時期或改革之後，中國高速積累所造成的巨大犧牲得以達成，都有賴於「偉大民族復興」這個政治宗教，在這樣的莊嚴偉大之下，個人的選擇自由可以被棄之不顧，因為唯有「昇華」到更高的大我中，個人「真正的」、「永恆的」自由才能圓滿達成。

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犧牲大多數低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資本積累，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右派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排除任何自由市場的障礙，以達到最大積累；左派則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發達國家資本」，才能有計畫的達到高速資本積累。左右合鳴，由威權國家機器這隻看得見的手強力介入，改造社會，迫使社會配合高速資本積累。關於這點，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有頗為生動的描述：「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拚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

⁹ 參見張茵，〈血汗工廠「風波是遭人嫉妒」〉，《廣州日報》，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一日。

¹⁰ 參見秦暉，〈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26/110530341.html>。擷取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¹¹

余英時教授曾論斷，原始儒家立基於道統，對君主專斷的權力持批判的態度，但是漢朝之後儒家逐漸法家化，原始儒家批判性的「仁義之道」被代換成法家「尊君卑臣」的君主權力壟斷。陽儒陰法的結果是，君王們可以用儒家仁義禮教的道德理由，遂行他們「賞罰不測，群臣震恐」的權力專斷，而知識分子則必須「與時俱進」、「曲學阿世」，為這種傳統中國權力差序格局構築各式精巧的詭辯，成為附庸權力、「以經術潤飾吏事」的紹興師爺。¹² 如果我們說這個「君」指的是一個無須人民同意的權力壟斷集團，而「臣」指的是底層農工勞動者，那麼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體現的，還是以「尊君卑臣」邏輯，進行重商主義式的資本積累，只是它現在的響亮的外號是「納貢體系的歷史復歸」或者更通俗地說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 四、世界體系的轉型與臺灣沉重的未來

一九五〇年馬歇爾(T. H. Marshall)提出社會權(social right)概念。他指出人民有公民權(civil right)、政治權(political right)與社會權(social right)三種權利。十八世紀首

先出現公民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保障個人言論、宗教與財產的自由；十九世紀中葉，勞工開始爭取結社權、參政權，直到一九一〇年代勞工與婦女取得參政權後，人們擁有的權利才從公民權進展到政治權。¹³ 馬歇爾提出社會權的重要性在於，對經濟弱勢者而言，在沒有社會權保障基本生活條件之前，個人自由與參政自由都是可望不可及的空洞之物，因此，唯有國家保障人民的基本經濟安全、完全享有社會保障、生活在一個普遍標準的文明條件下，才能在實質上確保公民權與政治權。從這個觀點延伸，「自由」在實踐上涉及兩個層次，一個是liberal democracy的概念，另一個是social democracy的概念。前者指稱的是法律保障的形式平等，後者牽涉到維持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前者的概念支撐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者則構成《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基本理念。法律保障的形式平等當然重要，但如果欠缺實質的平等，那麼形式上擁有的權利不但是空洞的，甚至還帶有欺瞞性。因此，自由市場

11 參見秦暉，〈中國模式特點是非民主平台〉，<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25/110529684.html>。擷取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12 參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一九七九。

13 T. H. Marshall and Tom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不會導向自由社會，恰恰相反，以自由市場做為社會組建的原則只會走向自由社會的反面，因為在自由市場中，只有資本家擁有完整的自由，包括剝削勞工的自由、污染環境的自由、壟斷價格的自由、要求政府租稅補貼的自由、金融不動產炒作的自由……。

通過專斷威權的國家控制所產生的「廉價勞動力」，如今經由自由化的商品貿易與資本流動形成全球性的勞動力「中國價格」，大大強化了全球資產階級對抗國家的投資罷工力量；也構成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以來，形塑臺灣國家與社會的主要力量。在臺灣，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國民黨主政下的行政院展開國營事業民營化，將壟斷性的上游產業與金融電訊業開放給私人資本家，後者是長期依賴國家特許而獲利豐厚的資產階級，也因此成為支持國民黨威權壟斷政權的盟友。當中共政府試圖用經濟力量買下臺灣，它所委託仲介的正是國民黨過去建構起來的裙帶資本主義。所以，真正統一的是兩岸的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崛起的民族口號下，共同剝削兩岸基層民眾的血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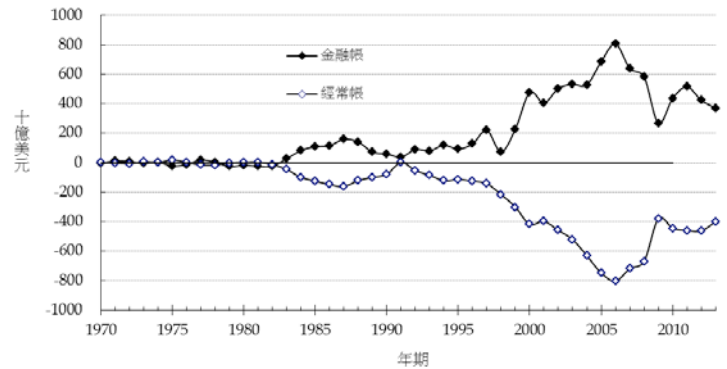
這個結構的困局未來會有什麼轉變？對中國與臺灣而言，關鍵性的轉變因素是什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從東亞發展模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來理解。東亞的「出口帶動成長」模式依賴對美國的大量出超，這些出超國持有大量的美元儲備會在該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匯兌，轉化為本國貨幣進入該國，由此產生了兩種相互依存現象，第一種是各國央行持有的美元外匯要求一個適當的再投資管道，以確保其價值與

盈利。在安全性與流動性的考量下，現實的情況是持有大量美元外匯的國家大多選擇購買美國的公債、公司債或股票，美國就以這鉅額的金融帳收入來融資貿易與預算赤字，繼續維持其購買力。第二種，當美元儲備進行匯兌，轉化為某一國家的貨幣而進入該國時，它就造成該國的貨幣供給上升，其作用一如該國央行注入強力貨幣（*strong power money*），會在銀行體系不斷的借支與儲存中產生信用創造的效果，從而提高該國的投資強度，當外匯流入的速度過快，就會發生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的現象。過剩的產能更加依賴美國的購買力吸收，因此也加強了出超國對美國融資的必要性。換言之，美國以不斷印製的美元交換對美出超國源源輸入的商品，而這些輸出的美元又有一大部分回流到美國，用以支撐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購買力；美國由於其獨特的金融地位，得以用賒借的方式使用全球的資源。

這個「美元循環」的過程是以美國不斷高築的債務為動力，最終這個循環一定會遇到美元發行過多而導致美元貶值與美國清償能力的問題。每一次的美元貶值調整就會導致主要貿易伙伴幣值上升與對美出口下降，此時，這些依賴對美出超帶動成長的國家就必須加強其資本輸出，以及尋求其他的出口市場。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廣場協定正是這樣一個結構性的轉折點。這一因應美國金融危機的升值行動引發了東亞區域一波波由上往下的對外投資流動。一開始只有對東南亞的投資，但一九九二年中國確

定對外開放政策，加上關鍵性的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加速東亞資本以國外直接投資（FDI）的形式進入中國。在全球由開發中國家吸收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投資中，中國吸收 FDI 占全世界的比例由二〇〇〇年的百分之四點一穩定而快速地上升到二〇〇四年的百分之九點四（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2004*）。

中國通過這個雁形產業資本的方式融入世界體系，所以它是東亞，特別是臺灣與香港，對美國三角貿易的海外生產基地。因此，原物料、FDI、技術的輸入，以及最終產品的對外輸出，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模式不是中國特有發展的狀況，而是東亞自戰後以來的典型模式，通過製造業的跨國投資轉移到中國。中國因此具有雁形體系國



圖一——戰後美國的金融帳與經常帳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MF Statistics Department。

家的幾個主要特徵：對外市場依賴、外匯儲備上升造成的生產過剩、技術依賴。中國善加利用雁形體系分工轉型的機會，增加經濟成長的動能，但中國所累積的貿易順差與外資將如同過去雁形體系國家一般，對國內造成金融泡沫與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是這次將以更大的規模衝擊世界經濟結構（圖一）。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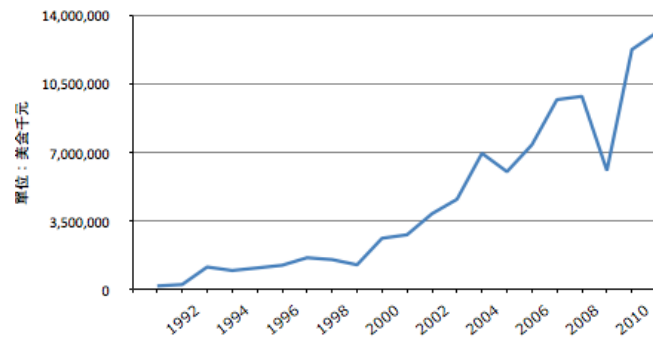
結構上而言，中國很可能會重蹈一九八〇年代東亞國家的金融泡沫，而在這次金融泡沫之後，生產力與利潤率過低的投資都將被掃入金融壞帳的歷史灰燼中，只有高生產力的產業能存活下來，並利用經濟衰退之後空出來的產能重新出發。因此中國經濟的未來可以是重建內需，成為世界市場領導世界體系，也可以是產業升級，從供給面再次帶動成長。後者似乎更重要，也是中國政府目前更為著力的政策方向。

那麼臺灣呢？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就在談產業升級，但從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臺灣走上了一條短期有利，如今卻承受苦果的發展方式。臺灣的製程技術在中國自主供應鏈快速追趕之下，臺灣資本家逐漸往幾種方向發展。中低階技術的中小企業在中國勞動成本上升情況下，要不就轉進東南亞尋求更低廉的勞動成本，要不就結束營業，

¹⁴ 由於中國繼承的是東亞的出口導向工業化資本，因此也同樣以美國市場為大宗。所以美國的貿易赤字與中國的貿易盈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也就是學界所討論的，中美貿易失衡（unbalanced trade）的問題。

回臺投資房地產與股票市場。另一種製程技術同樣不高，但依靠量產取勝者，如鴻海，因為短期內難以大規模移動，而且營收一半來自中國，與中國形成命運共同體，不得不轉往中西部尋求發展。至於擁有較高技術者，如台積電，現在則再度面臨中國以「國家冠軍隊」模式進行蠶食鯨吞。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過去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依憑中國廉價生產要素來維持利潤，卻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最後逐漸面臨被中國製造技術追趕的窘境，並付出自己社會內部發展不均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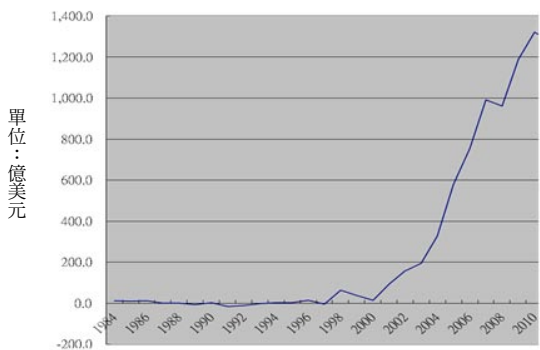
臺灣對中國的投資在一九九〇年代已經展開，但是在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才急速上升，二〇〇二年超過臺灣對外投資比重六成，之後就不曾下降，二〇一〇年之後持續上升，甚至達到八成以上（圖二）。勞力密集產業快速



圖二——臺灣歷年對中國投資金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

移出產生「臺灣接單，海外出貨」之三角貿易成長模式，至今海外生產比例已超過百分之五十，其中九成的生產基地在中國大陸（圖三）。通過這種商品與資本流通的自由化，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價格對臺灣勞工的就業條件與薪資加重了競相沉淪 (race to the bottom) 的作用。由於勞力密集產業移出，臺灣產業工會會員組織率由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七下降到二〇〇五年之後的百分之十五上下，對應工會虛弱化的則是失業率上升、實質薪資停滯與勞動條件惡化。臺灣的失業率在一九九五年上升到百分之二點六以上，二〇〇〇年之後再次上升到百分之三點九一，其中非自願性（結構性）失業率（百分之三十二點一六）在一九九九年超越首次超越自願性失業率（百分之三十點三九），在二〇〇二年與二〇〇九年甚至達到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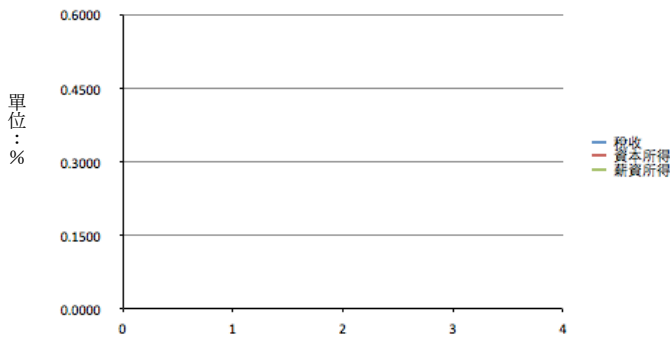


圖三——臺灣三角貿易金額的上升

資料來源：財政部

分之五十上下¹⁵，明顯反應臺灣失業與產業外移的關係。至於實質薪資方面，一九九一年之前還維持跟經濟成長率相同水準的成長，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九年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六點三，實質薪資成長率已經降為百分之三點八，二〇〇〇到二〇一一年，實質薪資成長率為百分之三點四，但薪資購買力卻負成長百分之零點六！¹⁶

勞資雙方力量的結構性變化還表現在國家財富的分配。如果我們將GDP分解成受雇人員報酬、間接稅淨額、固定資本消耗、企業營業盈餘，那麼第一項是國家財富以薪資方式分配給勞工的份額，第二項則是由政府獲得的稅收，第三與第四項都是資本利得，由資產階級獲得。由此觀察，政府的稅收佔GDP比例從一九八〇年代就持續下降，薪資所得比例則是



圖四——資產階級在財富分配上的上升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稅署

從一九九〇年開始日漸下滑，資本所得反之快速上升，直到二〇〇二年呈現逆轉，至今天的趨勢是持續溫和擴大（圖四）。以全球化為名的自由化不可避免會造成資本集中、貧富差距，以及由之而來的社會差距。臺灣的資產階級跟中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自由化果實的同時，臺灣的勞工則越來越趨近中國勞工的勞動條件。

臺灣依循資產階級賺取利潤的路徑，依賴中國廉價生產要素來維持短期利潤，卻棄長期產業升級的動力於不顧，將所賺取的利潤以資本利得的方式回到臺灣進行金融與不動產的炒作，一起加入中國帶起的金融泡沫中。在泡沫破裂之後的衰退期，如果臺灣的產業技術慢於中國，那麼臺灣經濟從金融到產業將無可避免地通過兩岸政治與經濟菁英的中介，全面依賴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臺灣實質（de facto）的獨立也就轉成實質的統一了。屆時，人權、民主、自由失去物質力量的植根母體，將會如同離根的落葉，沒有生活的內容，只有抽象空洞的憑弔意義。臺灣的太陽花學運抗爭必須提到這個歷史高度才能探觸到臺灣歷史的主旋律。

15 主計處就業與失業統計，<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29>。擷取時間：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16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協會，二〇一一。

參考書目

中文

- 王振寰（一九九六）。《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
- 余英時（一九七九）。《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二〇一一）。《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 吳挺鋒（二〇〇四）。《財政政治的轉型：從威權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 蔡宏政（二〇〇七）。〈全球化、區域整合與中國崛起的條件〉，《思與言》四十五（二），頁一〇二九。
- 蔡宏政（二〇一二）。〈中國社會福利體制階層化的政治經濟學根源〉，《台灣社會學刊》五十，頁一一一～一六三。
- 瞿宛文與洪嘉瑜（二〇〇二）。〈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四十七，頁三三〇～三三三。

英文

- Lardy, Nicholas R (1987).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In Mac 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 Marshall, T. H. and Tom Bottomore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luto Press.
- Selden, Mark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